

天主教 早期傳入中國史話

王书楷编



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史话

王书楷

内部读物

一九九三年春

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史话

王书楷编

湖北省蒲圻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7.5印张 18万字

1993年春出版 印数1—10000

准印证 (1993)鄂咸蒲图内字第03号

序

我与王书楷司铎神交已久，加深我对他认识的是通过这一书稿的审读。我在审读这一书稿的过程中，深感王司铎知识广博，学习勤奋，写作态度严肃认真。这本书就事论事，不枝不蔓，语文简练，情节生动，是一本内容健康，知识性很强的读物。

我认为这本书所介绍的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段段故事，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故事本身。因为天主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文化融合，浑然一体，现在那悦耳的《爱的奉献》的歌声，那些感人肺腑以“爱”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与天主教精神若合符节。天主教倡导“爱人如己”，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老子说：“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把慈放在了第一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朱熹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们共同追求的是“成人”、“至人”，与天主教所梦寐以求的颇为接近。可以说，中国古人和天主教人士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立志要做一个有益于人的人。中国人以吃苦耐劳闻名于世，其思想基础就在这里。

解放以来，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中国天主教会，与社会主义是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与天主教的追求有显明的相似之处，天主教以“爱人如己”追求常生，社会主义以利国利民追求永垂不朽；天主教教人避恶行善，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是避恶，专门利人是行善；为人民利益牺牲的人，其精神永远活在人民

心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决心要把天主教那遥远的天堂建设在现实世界里，四化建设就是天堂工程，天主教极力拥护这一工程；努力建设人间天堂的人，必然能享受真福，进入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中国天主教人士以其聪明才智投身四化建设，是有成绩的，全国目前信仰天主教的已近 400 万人，分布在各条战线，这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不可忽视，特别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其作用尤不可低估。

我认为这本书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以史实客观地介绍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天主教并非通过帝国主义的大炮送入中国的。1840 年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规定传教自由，那是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利用宗教为掩护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罪证，不能张冠李戴，不能因此误认天主教就是帝国主义，天主教被玷污了，被歪曲了；可耻的是天主教人士中竟有人被愚弄、被利用而无以自拔。

天主教传入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景教虽非天主教，但给中国传来了基督福音。有一段时期，内外蒙古、黑龙江、新疆一带，信仰景教的不在少数。成吉思汗的后代和亲戚不少是景教徒，这属于第一阶段。在元代，罗马教廷与元朝往来频繁，并建立了正式关系。意大利人孟高维诺成为北京第一任总主教，他在中国传教 36 年，在北京建立教堂；泉州也成立了主教区。元朝灭亡，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亦告中断，这属于第二阶段。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东来，进行学术传教，介绍西洋科学，为中国文化赶上世界潮流作出了贡献，这是第三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总的结局是悲惨的，根本原因在于教会大权没有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天主教在中国没有扎下很深的根子，这个问题在解放后才得到了扭转。

读这本书，除了增加一些有关天主教的知识之外，我对读者有三点希望：一是区分宗教与迷信的界限。宗教劝人为善，讲究修心养性；天主教是正视现实生活的，以圣化心灵，美化世界，以达至圣至善之境；照我的理解，天主教是以入世的步伐走出世的道路；为现实服务得越好，就功德越高，死后的福乐越大。迷信是以谎言骗人，信口雌黄，假借鬼神，散布迷雾，如测字算命之类，完全是自欺欺人。二是消除对天主教的误解，天主教不是帝国主义，天主教的教理、教规是不容许反社会主义的，严禁背叛祖国，背叛人民；天主十诫中的第四诫孝敬父母，即包括爱父母之邦。中国天主教人士在历史上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明代的徐光启为爱民而研究农业，为爱国而介绍西洋科学，成绩卓著；马相伯受外国传教士的排斥，在震旦大学无立足之处，他创办了复旦，以与外国传教士抗衡，其爱国爱教精神值得敬佩。三是消除对宗教的神秘感，宗教意识集中到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创造；一个人要使自己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坎上，就要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以致用，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利国利民，超凡入圣。这是我对读者的祝福。

王瑞明

1992年12月22日

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史话

卷 一

引 述——唐朝的聂斯多略教派.....	(1)
第一章 第一至第七世纪（汉朝——唐朝）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一些传说	(1)
第二章 唐朝的聂斯多略教派之由来	(4)
景教碑的发现给中国宗教史带来了新课题	(4)
景教碑的研究	(5)
敦煌稿卷	(6)
景教最后的厄运	(7)
第三章 对景教的研究	(9)
聂斯多略教派的来历	(9)
景教碑与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	(10)
景教在中国灭绝的原因	(12)

卷 二

元朝时代——天主教第一次传入中国	(14)
第一章 元朝时代的也里可温	(14)
唐武宗灭佛令后的景教	(14)
元朝的武功	(14)
元朝的宗教政策	(16)
第二章 欧洲天主教会与元朝	(17)

罗马教宗和欧洲国家对付元军的策略	(17)
波罗弟兄东来西归	(22)
孟高维诺	(24)
三位主教来华	(27)
其他方济各会会士	(28)
天主教在中国之湮灭及其原因	(30)
拉班·扫马和马可二修士	(31)

卷 三

明朝部分——天主教第二次传入中国 (35)

第一章 圣方济各·沙勿略	(35)
印度开教简介	(35)
沙勿略简史	(36)
沙勿略东渡	(37)
不速之客	(38)
新的启示	(39)
中途遇阻	(41)
上川岛上	(44)
圣人之死	(47)
对沙勿略之评议	(49)
第二章 再度远征的尝试	(49)
澳门这个城	(49)
范礼安	(51)
开始行动	(52)
第三章 开始与官府周旋	(55)
第一次拜见总督	(55)

意外风波	(57)
第四章 上主的初慰与再次的磨难	(60)
飞来之喜	(60)
整理行装赴广州	(61)
在肇庆落脚	(62)
开始播种	(65)
第五章 惨淡经营祸从天降	(67)
孤立无援	(67)
教堂遭石击	(68)
满城风雨传到官府	(69)
风平浪静	(71)
第六章 增添工人	(72)
孟三德与麦安东	(72)
节节失败	(74)
第七章 多难之秋	(75)
又遭驱逐	(75)
来自教徒的麻烦	(77)
再起风暴	(79)
罗明坚西归利玛窦一身当难	(80)
第八章 阵阵风雨过去后的肇庆教会	(82)
第九章 传教士终于被迫离开肇庆	(84)
合乎情理的揣度	(84)
几番友谊的帮助	(85)
一线希望	(86)
最后的结局	(87)
别离	(87)
第十章 转来韶州	(89)

中途被追回	(89)
去韶州	(91)
第十一章 在韶州工作的开展	(93)
韶州教会之初建	(93)
瞿太素	(94)
第十二章 在韶州的欢乐与悲哀	(95)
麦安东逝世	(95)
又遭石击	(96)
石方西	(98)
南雄开教	(98)
第十三章 夜遭袭击	(100)
歹徒闯院闹事	(100)
审讯	(101)
一点慰藉	(102)
利玛窦失了右臂	(103)
第十四章 传教方法之改革	(103)
检讨	(103)
如何有机会去南京	(105)
南京的打击	(106)
梦的安慰	(107)
第十五章 在南京与韶州的意外骚扰	(108)
转危为安定居南昌	(108)
韶州的骚乱	(110)
第十六章 去北京	(112)
在多次失败中找到的出路	(112)
启程北上	(113)
失败	(114)

第十七章 在南京定居	(116)
在南京学术的传播	(116)
在南京置买房产	(117)
第十八章 再次北上京师	(120)
南京开教与启程北上	(120)
太监马堂	(121)
神父们成了囚犯	(122)
奉旨去北京	(124)
进入京城	(125)
在京被囚	(127)
久经努力终获成功	(130)
朋友与归信者	(131)
第十九章 韶州和南京教会	(133)
韶州的麦黄季节	(133)
时兴时衰	(134)
第二十章 北京教务的开展	(135)
教友与教会的住所	(135)
中国教会奠基人之死	(137)
第二十一章 一场轩然大波	(137)
祸端之初起	(137)
导火线发生在教会内部	(138)
第二十二章 鄂本笃和依撒	(140)
探险的动机	(140)
走上征途	(141)
黎明了	(144)
探险人之死	(145)
第二十三章 各地教务情况	(149)

南昌	(149)
北京	(153)
南京一带	(153)
第二十四章 利玛窦之死	(156)
过度的操劳	(156)
逝世	(157)
哀悼	(159)
第二十五章 北京教士墓地	(160)
遗体埋葬	(160)
奏疏上呈	(160)
御旨下达	(161)
一些麻烦	(163)
安葬	(165)
第二十六章 教难	(166)
第一次教难	(167)
第二次教难	(169)
第二十七章 教难后的教会	(170)
金尼阁神父的业绩	(170)
传教士参与历法工作	(171)
第二十八章 多明我 和方济各 两修会会士来华	(172)
开始几位的来历	(172)
两修会会士进入中国后的情况	(173)
开始有了裂痕	(174)
第二十九章 明末的教会	(176)
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	(176)
清兵入京	(177)
明朝之覆灭	(180)
附：明末教会中的主要人物	(180)

卷 一

引述——唐朝的聂斯多略教派 第一章 第一至第七世纪 (汉朝——唐朝) 关于基督教 传入中国的一些传说

中西交通在陆路上打开一条通道，应当归功于汉武帝刘彻，他两次（公元前 139 和 119）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海路也逐渐通畅，只是较晚一些。中国人由内地去西域，是通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再西行，就在大沙漠以南、以北分路，抵达波斯湾或地中海。这条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古代坎坷万里路程已由今天的喀喇昆仑公路所代替。它是由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起，途经三大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帕米尔山脉和昆仑山脉）至中国新疆地区的古老贸易城喀什。

所说的西域，包括着广大中亚和西亚的地区和国家：大夏（今阿富汗）、安息（古波斯，今伊朗）、条枝或称大食（古阿拉伯）、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息在中西陆路交通中，是一个贸易中心地带。中国的丝绸向西输送到安息，再由那里向西达到罗马。历史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时代，皇宫内廷已多穿绸缎了。中国被西方人称为“赛里斯”。这个名词来自希腊文“赛耳”，就是丝绸的意思；中国就是“丝绸之国”。

传说，东汉年间（25—220）有两个东方教会（行东方礼的天主教会）的传教士曾经到过中国。他们之东来，是以学养蚕为名，实际是为传播基督信仰。可惜，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传说罢了。

西方最早认为基督教在教会初期就传入中国的作家是阿若比尤斯，约在公元 300 年，他的《驳异教者论》里就说：“传教工作可以说遍及印度、赛里斯、波斯和米底斯。”可是在他这段话之后，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可以说服人；早期的教会传说也与此不符。

公元 500 年左右，有一些东方教会的传教士，为了把中国的养蚕业移植到西方去，在那里就地开展丝织手工业，而来到中国，他们将蚕卵藏在竹制的手杖里，偷偷带回，纵然这是件史实，但没有其它佐证，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传教工作。

16 世纪以后，在教会内盛行了一个传说，特别是在印度：宗徒圣多默从耶路撒冷向东出发，从波斯东行到了印度，远至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教会；后来他又回到印度，在印度南部的马拉浦殉难。深信这个说法的，要以后来到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为最热衷。利玛窦就认定圣多默到过中国。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在印度马拉巴教会收藏的用叙利亚文写的《每日祈祷文》。下面是节录：

“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
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
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
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从这几句祷词看去，宗徒圣多默到过中国是确凿无疑了。圣沙勿略（1506~1552）在印度传教时，给他的总会长

写信，也表示确信为真。可是，以后的例证恰恰与此相反。

早在元朝时代（1350）罗马教廷派往汗八里（北京）的传教士孟高维诺（1247~1328），他在来中国途中，在南印度圣多默教堂里逗留了十三个月，对圣多默的行迹该有清晰的认识了。可是在他从中国寄给方济各会总会长的信中却是这样写的：“这些地区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宗徒或他的门徒到过这里。”这是他在描述聂斯多略派怎样迫害他个人和破坏他的传教事业中的一句话。

再者，一些史学家指出，《每日祈祷经文》的文体该是13世纪的作品。古代天主教会史学者记载宗徒多默传教的地区是帕提亚（今伊朗北部）和波斯。多默也是在那里为主殉道的。

那么，许多基督信徒，尤其是印度天主教徒所一致认为的圣多默到底是哪一位呢？教会史研究者作了一些合理的猜测：很大可能是后来一位与多默同名的热心传教士，在印度作出了卓著的成绩，而为后人误认是宗徒多默了。

局限于那时单一史料《每日祈祷经文》的发现和由耶稣会士如火如荼的共鸣心理所致，沙勿略、利玛窦以及后一期的耶稣会士热衷这一信念，从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不可有所贬责。后来由于更多资料和发现，就说明圣多默东至中国实属讹传。为此，人们对自己先前的信念，就逐渐淡漠了。近代史教会研究者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本世纪初《圣教史略》编著者耶稣会士肖若瑟也持否定意见，在该书中他是这样写的：“圣多默……有说亦至中国，然无甚确据。”

第二章 唐朝的 聂斯多略教派之由来

景教碑的发现给 中国宗教史带来了新课题

1625年3月间，在陕西距西安约一百六十华里的（现在的周至县）附近，有人挖土建房，从地下不太深处挖出了一通石碑。碑文所载可分为四部分：最上端是一个十字，十字下刻着九个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二龙盘绕；再下是碑的正文，用正楷汉字书刻；下部是用叙利亚文记录的七十多位传教士的名字和职称（主教三名、副主教四名、其他则为司铎和无品修士）。发现人把事情报告给知县，知县观看了石碑后，就命人将碑运到崇仁寺。到了1907年才迁往西安府学内的碑林。

当年发现这通碑的时候，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张赓虞最早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对这一发现特别重视。这人早在十八年前在北京就见过利玛窦，他也认识一些其他天主教界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利玛窦宣传的宗教恭敬十字架；他断定这通碑与天主教必有关联。于是他把自己的一份拓本送给当时的中国新教友著名的学者李之藻。李之藻对碑文作了注解。1625年10月，耶稣会会士金尼阁（1577~1628）神父来到西安，他是见到这通碑的第一个欧洲人。他把碑的正文译成拉丁文。这是外文的第一个译本。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欧洲，尤其引起了宗教史学家们的关注。以后各国学者时有来观赏者，研究这件古代遗物。在研究的外国人中，要算耶稣会会士最为重视了。他们分别译成拉丁、葡、意、德、法、英等

文字。日本宗教史学家佐伯好郎在晚近（1916）也译成英文。

从建碑（781）到出土（1625），长达八百四十年，这块古石安稳地睡在地下，不为人所知；似乎它是在故意同研究者玩捉迷藏。它既然展现在人面前，那么史学家、尤其是宗教史学家就有了一个新课题。

景教碑的研究

碑的正文共一千八百多字，分两部份。前一部份原文是：“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杳然灵虚，后而后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惟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这一段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信奉一位真主创造了万物；人类始祖被撒旦所诱惑，因此堕落；相信上主是三位一体的神；默西亚降来救世；人类接受洗礼可以得救。接着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和在中国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史。这一部份是唐代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且有很高的价值。下面要略介绍。

碑文记载：大秦国（此处指波斯）主教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来到唐朝的首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盛大礼遇。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领朝廷仪仗队，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皇帝让阿罗本主教在皇宫藏书楼翻译圣经，并在皇室内与众臣讨论他所宣传的教义。太宗对景教教义很满意，过了三年，谕准他出外自由传播他的信仰。不久，宫廷还拨款在长安建造了大秦寺（教堂）。《唐会要》所载与碑文所述基本相同。贞观十二年诏令：“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玄要，济物利人，宣行天下。所司即